

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理论与方法^{*}

裴长洪 倪江飞

摘要:实体经济是大国综合国力的根基,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重大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大部类物质资料生产、“三位一体”的资本循环周转等多维度分析论证了实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为我们正确认识实体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脱实向虚”不仅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也是引起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我国是依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根本途径,也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基本任务。为此,要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内生动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通过供给改革与需求管理的动态协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形成开放型的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引致供给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关键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实体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经济建设任务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明确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①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方针,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界定实体经济的科学依据

(一)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的统一是实体经济的一般抽象和基本内涵

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前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创造一切历史的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②。为了生存,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要生产满足衣、食、住、行等这些基本需要的产品。并且,人类在能够生活的基础上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样离不开物质资料的支撑。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以物质性商品生产作为理论逻辑起点的,其生产、交换和消费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本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是要满足人们各个方面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即人们生产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针对生产者自身有用,而是针对他人、整个社会有用。社会分工使得每个生产者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为了满足彼此对另一方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需求,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从而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越来越细化的社会分工使得交换活动日益频繁,从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生产的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就是要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peichh736@163.com;倪江飞(通讯作者),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38,电子邮箱:nijiangfei2014@163.com。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使用价值。价值形成过程包括将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和创造新价值的过程。若价值形成过程恰好到某一定点,即产品的价值恰好等于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纯粹的价值形成过程。若价值形成过程超过了这一定点,那就是价值增殖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①因此,价值形成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基础。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为了追逐利润(价值增殖)而进行生产交换。在这个目的的驱使下,其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必定要超过所消耗的生产要素的价值。交换过程是商品实现的“惊险一跃”,只有完成交换过程,才能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进入消费环节并实现价值增殖。因此,在一般市场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的共同实现都是实体经济的一般抽象和基本内涵。

尽管追求价值增殖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不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中,全社会追求价值增殖的根本目的具有显著的差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追求价值增殖就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②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另外,两种价值增殖的分配方式和结果也不同,前者产生的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归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占有,而后者主要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并由社会主义国家支配全体人民共同实现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并造福于人民。

(二)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再生产过程是实体经济的外延和基本内容

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是以连续的、周而复始的物质生产为条件的。实体经济的社会再生产是指市场经济中互为联系、互为条件、相互交错的各个生产部门的再生产之和,是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再生产的统一。首先,从实物形态上看,实体经济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再生产和消费资料再生产。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需要进行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以直接满足人类的物质文化需要,另一方面需要进行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为消费资料的再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因此,实体经济再生产既是消费资料的再生产,又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体现了实体经济再生产的目的与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从总量和结构角度来看,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必须实现总量和结构的平衡。实体经济再生产的顺利实现,是以这两种资料的再生产之间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为条件的。这种联系体现在,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既要满足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补偿需要,又要满足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另一方面,消费资料的再生产不仅需要满足两大部类对生活资料的补偿需要,而且需要满足它们追加劳动力而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社会经济中,生产资料再生产的速度往往大于消费资料再生产的速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③其原因在于,随着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从而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中追加的用于生产资料的这部分资本所占比重也会相应地增长。当然,这种较快增长并不是片面、孤立的增长,而是有条件的增长,即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不是实体经济再生产的根本目的,其再生产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消费资料扩大再生产所提供的市场。

(三)为“三位一体”资本循环周转服务的劳动是实体经济的延伸

在市场经济时代,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生产要素和一种生产关系,资本为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资本运动的原动力是谋求价值的增殖,但是能够发生价值增殖的资本只能是产业资本。同时,资本是特殊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因而其在运动中具有多种形态。为了实现价值增殖,产业资本需要从最初的货币形态出发,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售卖等阶段,并相应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形式,最后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一过程就是资本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714页。

^③《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循环。只有这三个阶段相互依存、紧密衔接,资本循环才能畅通,进而价值增殖才能得以创造和实现。为了不断地实现价值增殖,创造更多的财富,资本循环必须不间断地反复下去,这种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循环是资本周转的前提与基础,“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过程,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①。在每次资本周转带来的利润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周转越快,一定时间内所创造的总利润就越多。总之,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条件。

为了畅通“三位一体”的资本循环周转,于是在商品资本循环中产生了商业劳动、仓储运输劳动以及零售、餐饮、快递、修理等服务劳动及相关行业;为研究设计新商品而产生的研发劳动和行业;在货币资本循环中产生了借贷资本和金融服务等为实现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增殖服务的各种劳动和行业。它们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补充。

(四)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以及在行业分类中的识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和分析了虚拟资本,认为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的特殊转化形式,也是生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以有价证券为代表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如股票和债券;另一种是基于信用产生的,包括商业汇票、银行汇票和银行券等。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在资本关系中取得了最富有拜物教的表现形式。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自我增殖的、自行创造的物,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看不见了。这种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相比,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它的发展“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②，“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③。恩格斯指出,金融贸易一旦同商品贸易相分离,就有了自己的发展规律。当金融贸易发展到证券贸易后,金融就不仅受生产所支配。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的危机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作用。^④他还指出:“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⑤

虚拟资本是产生虚拟经济的母体,其基本特征是脱离物质资料生产,资金只在金融机构之间交易和循环,例如许多所谓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产品。一些物质产品通过金融交易所的投机炒作,也会类金融化,产生虚拟经济,例如某些大宗商品和石油、黄金等。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指出了虚拟经济的特征:“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房地产本来属于实体经济,但用加杠杆的办法进行房地产投机就不同了。”^⑥从上述可以看出,实体经济涵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活动的服务业。在现代社会,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制造业,成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和主体。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既可以与物质资料生产紧密结合,成为实体经济或实体经济的延伸;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在资本行为规律的驱动下脱离物质资料生产和价值实体演变为虚拟经济^⑦,甚至泡沫经济。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一些只在网络空间完成交易和消费的活动也容易成为虚拟经济,例如网络游戏,因此,要强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虚拟经济活动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金融市场、资本市

①《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②③《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7、500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5—59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4页。

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⑦关于虚拟经济,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义,有三个不同的概念翻译成中文后均为虚拟经济。一是 fictitious economy,主要指与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有关的经济活动;二是 virtual economy,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媒介的经济活动;三是 visual economy,指的是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

场、房地产市场和网络市场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少虚拟经济活动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认识它的两重性,关键在于驾驭资本,设置必要的“红绿灯”,让这些市场中的虚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阻碍。

二、资本主义经济“脱实向虚”的内在机理和实际现象

(一)单纯追求价值财富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趋势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物质载体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①为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值,同时应对来自外部的残酷竞争压力,资本家不得不干着生产商品这样的“倒霉事”。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心理天然驱使资本家对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带来的财富产生梦想。他们“都周期地患有的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②。资本家之所以有这样的“狂想病”,是因为人类社会对财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社会,统治阶级追逐的财富主要是以形形色色的使用价值来表示的。例如,中国古代官员的俸禄往往是以粮食计算的。这种以实物为计价的财富积累受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实物自身保值等条件的限制,因而导致统治阶级的财富是有限的。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成为资本家衡量财富的标准。“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③货币的这种属性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为资本家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以谋取更多的财富创造了条件。

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谋求价值增殖活动的总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信用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使得虚拟资本的积累能够跳过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而得以实现,进而使得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独自运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双重影响决定了虚拟资本增殖的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参与产业资本循环来谋求增殖。在这样的参与方式下,虚拟资本增殖方式用公式可表示为: $G-(G-W\cdots P\cdots W'-G')-G''$ (括号内为产业资本循环, G'' 为利息)。这个增殖公式表明,虚拟资本在生产 and 流通过程中扮演着“润滑剂”和“助推器”的角色,通过服务于资本^④的扩大再生产来实现增殖的目的。不过,由于产业资本每次循环带来的利润有限,导致每次循环带来的虚拟资本增殖额同样有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⑤可见,这种虚拟资本增殖的实现是以产业资本的正常循环为条件的,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虚拟资本增殖目标便将无法实现。二是脱离实体经济在自身内部自行增殖。虚拟资本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⑥,因而可以获得定期的收入,且能够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以实现增殖。其公式可表示为: $G-G'$,这种“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⑦。虚拟资本的第二种增殖方式将资本具有摆脱一切物质束缚以实现自由逐利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提升、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及信息技术跨越式发展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虚拟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和膨胀,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二)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

虚拟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效融资工具、推动实体经济存量重组和结构调整、有效降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风险等;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具有脱离实体经济进行野蛮生长的内在“冲动”,很可能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良后果。

①②《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7-68页。

③《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④这里的资本是指经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

⑤⑥⑦《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531、440页。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际资本和虚拟资产借助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会快速向全球扩张,在直接谋取资产差价的利益驱使下,虚拟经济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其发展目的是为当事人创造货币财富服务,违背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不再服务于和受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虚拟经济,其盲目发展引起大量资源从实体经济抽离转而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为了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来推动。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实体经济占其GDP比重处在55%~66%之间,但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38.43%。其中,制造业占比从22%~27%下降到11.72%。与此同时,虚拟经济占GDP比重从15%~19%上升至32.7%。^①美国制造业对GDP贡献度的下降造成制造业吸纳就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80年的21.6%下降至2010年的8.9%。^②此外,美国制造业的持续萎缩使得其对外经济交流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从贸易顺差大国转向贸易逆差大国。1950—1970年间,美国年均贸易顺差为20.45亿美元,而到了21世纪前20年,其年均贸易逆差为7705.31亿美元。^③另一方面,从全球债权国转向全球债务国。与经常项目的贸易逆差相反,美国成为各种债券和金融资产的净输出国。

其次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自我膨胀、野蛮增长。在以生产性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国际化浪潮中,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主要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全球转移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充当金融资产交易媒介的货币交易量往往受到全球实体经济活动的限制,尚不能盲目野蛮增长。然而到了以大量资金和金融资产流动的虚拟经济国际化阶段,国际货币交易量大大超过了全球实体经济规模。由于“以钱生钱”要比制造业靠生产产品赚钱快得多,也得多(刘骏民、王兴,2014),大量的资本从生产和流通领域抽出,涌进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产业资本循环的内在逻辑被虚拟资本独立增殖的逻辑压倒(刘晓欣、田恒,2021),以至于90%以上的跨国金融交易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并不是为了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Drucker,1989)。在跨国金融交易量中,债券和股票发行与交易、外汇交易占据着主导地位。1975—1985年间,全球股票交易额占全球GDP的比重平均为10.64%,而在21世纪前10年,这一比重跃升至109.09%(见图1)。^④另外,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都是天文数字。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2022年4月份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超过了7.5万亿美元,^⑤而2021年全球GDP总量也只有96.29万亿美元。很显然,在这庞大的外汇交易中,投机性交易占据着很大的比例。总之,海量的股票和外汇交易额已经不受诸如劳动生产率、有效需求等实际因素的影响,而是在虚拟资本自我增殖、自我扩张的逻辑下实现自我膨胀。

虚拟经济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很容易吸引大量的投机者从事投机操作,从而产生金融经济风险。由于投机活动不是看资产未来的折现,而是看其买卖差价。而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存在使得一部分人对资产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以至于他们愿意以高出合理的价格购入这种资产。对这种资产的过度投机将引发虚拟经济膨胀,进而产生泡沫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虚拟经济过度偏离实体经济的一种自我纠正机制。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泡沫经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初的美国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言,其爆发除了由于美国政府放松了金融监管这一浅层次原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虚拟化带来的繁荣缺乏实体经济

①刘骏民:《决定中美经济未来差距的两个基本因素——虚拟经济视角下的大趋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②芮明杰:《欧盟再“再工业化”对我国的挑战与启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

③资料来源:根据UNCTAD数据库整理得出。

④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⑤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网站, https://www.bis.org/statistics/rpfx22_fx.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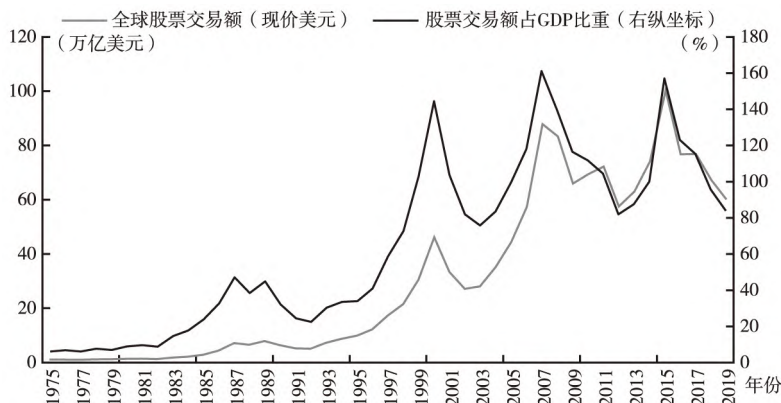


图1 1975—2019年全球股票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作为有效支撑。无论金融资本是否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它所依托的基础和最终利润来源还是通过产业资本“三位一体”周而复始的循环来获得的。同时,美国通过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各种金融资产将这场危机传递到全球各地。这场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时至今日其消极影响仍未完全消除。

最后是美元霸权对世界的掠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导致各国的货币不再具有含金量,彻底成为一种单纯的符号。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并没有随之结束,转而由唯一储备货币转变为主要储备货币。目前,美元仍是全球各国持有最多的外汇储备。根据IMF数据,1995年至2022年第三季度,美元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比的平均值超过了64.50%,最高时可达72.7%(2001年第二季度)。①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和价值贮藏货币,使得美国仅仅用非常低的成本印制美元就能消费其他国家的廉价资源,而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只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对等消费贸易伙伴的产品与劳务。为了收割全球廉价资源,美国一方面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长期逆差将美元输送到全球各地,另一方面通过发行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股票的方式实现美元的回流。随着各国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资本流动更加便利,这为拥有大量贸易盈余国家将其储备货币投资于国际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而美国凭借其国际货币地位、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发达的资本市场等优势吸引了大量的美元,这加重了美元霸权对世界经济的危害。

(三)资本主义国家为重振实体经济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发展的欧美发达国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次危机不仅让欧美国家重新审视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并且使它们亲自目睹了产业空心化下的经济结构在抗击重大危机面前的脆弱性,亲历了多年积累的“账面”财富瞬间化为乌有带来的痛楚,于是纷纷制定旨在让海外制造业回流的“再工业化”政策。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制造业促进法案》、出口翻番计划以及“投资美国”等政策,以推动美国尽快走出危机泥潭,继而巩固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紧跟美国的步伐,欧盟于2012年发布了《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报告,提出了要以“增强型工业革命”来确保欧盟工业的核心地位。2015年,为了提升德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主动权,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发起了“工业4.0”高科技计划。此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各自推出扶持本国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不过,欧美国家相继推出的“再工业化”措施,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引导这些国家在海外的制造业回归本土,而是借此谋求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以便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工业发展的制高点,应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虽然这些国家“再工业化”政策的实施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很难说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就美国而言,其制造业回流并未达到当初设想的目标,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①资料来源:IMF网站, <https://data.imf.org/regular.aspx?key=41175>。

比重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扭转(见图2),并且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低决定了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较低,2010—201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8%,甚至个别年份(2012年和2016年)为负贡献。另外,虽然美国增加制造业岗位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制造业吸纳就业人数占非农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多年保持在8.5%左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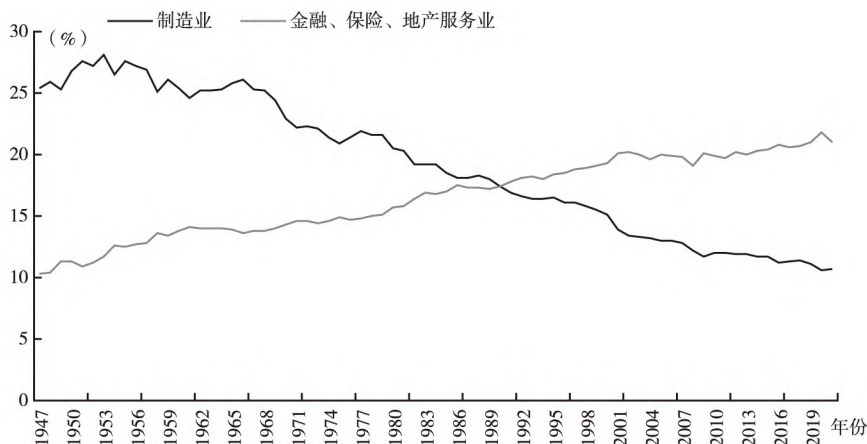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制造业与金融、保险、地产服务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BEA)。

三、实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基

我们党向来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支援革命战争,我们为发展革命根据地经济进行了艰辛而富有成效的实践,包括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抓手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积极发展工业以解决军民给养问题、逐步建立财政金融体系、完善商贸流通体系(彤新春,2021)。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轻重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以后发展成为实体经济大国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到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实体经济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②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③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④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性。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如“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实体经济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形态中的重大意义和基础性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显著提高,而这主要

^①杨盼盼:《美国制造业回流:怎样回流?效果如何?》,《中国外汇》2020年第12期。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1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④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6页。

是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实体经济为支撑的。我国的实体经济规模从1978年的3525.5亿元迅速扩大至2022年的1039574.9亿元,增长了294倍多,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84%以上,最高年份可达96.12%(1981年)(见图3)。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的时期(1978—2012年),实体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度高达91.73%。^①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使得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2013—2021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38.6%,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其贡献率比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还要高。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余种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②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得我国制造业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的比重从2010年的18.19%攀升至2021年的30.32%。^③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进一步增强了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2013年以来,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位居全球第一位(2016年除外),并在2020年首次实现对外贸易总额全球第一的好成绩。^④此外,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领跑全球,现代交通和通信设施全球领先,数字化信息建设得到跨越式发展。以上代表性指标有力支撑了我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实体经济大国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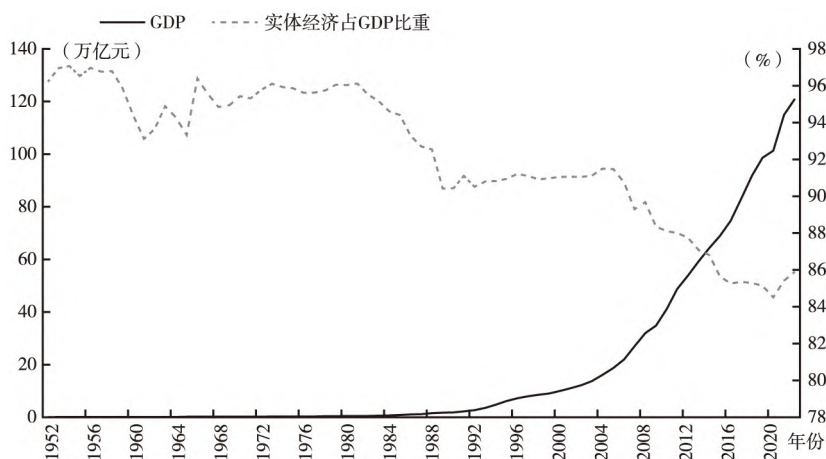


图3 1952—2022年中国实体经济占GDP比重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走向未来,我国更需要依靠实体经济。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离不开高水平的实体经济自立自强。首先,发展实体经济是我们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路径。历史经验表明,未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造成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是主战场。从需求角度来说,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引起制造业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化,进而推动消费升级,促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最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供给角度来看,制造业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条件和技术设备(郭克莎、彭继宗,2021)。因此,当前必须重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我国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⑤其次,发展实体经济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物质基础。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只能以实体经济为主要支撑,而不能依赖“钱能生钱”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能创造真实财富。在黄金非货币化后,虚拟经济创造的价值只是账面价值而已,并且这种账面

①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②④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

③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⑤Su & Yao(2017)对制造业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指出制造业对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的经济增长扮演着关键角色。

价值能否变现取决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一旦资产价格暴跌或庞氏骗局^①败露,虚拟经济创造的增加值^②将会瞬间蒸发,乃至爆发金融危机,给国民经济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正因为虚拟经济的这种内在缺陷和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③最后,实体经济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战略定力的最大底气。面对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脱钩断链的风险加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的不利国际环境,我们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有效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进而构建可靠的、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来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

(二)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根本途径

依靠人民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发展实体经济是贯彻这一理念的根本途径。纯粹的金融产品交易和炒作房地产等虚拟经济活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使少数人获利应当受到限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就业并享受发展成果。实体经济作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占比达22.74%,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同样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占比分别为12.69%和19.63%,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就业占比不到6.20%,其中属于虚拟经济的部分对就业的贡献就更低了。以新增单位增加值的就业人数增加情况看,2018年,在我国分行业每新增100万元增加值所拉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分别为2.59人和2.23人,均低于其他行业,特别是远远低于住宿和餐饮业(17.81人)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1.74人)(见表1)。其中,属于金融和房地产投机的虚拟经济的就业拉动能力就更小了。同样,对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也能得出类似结论。2018年,美国金融和房地产业每新增100万美元增加值仅能拉动2.02人的新增就业,而住宿餐饮业的这一指标高达21.82人。^④

表1 中国按行业分类就业情况(2018年)

	法人单位 (万人)	个体经营户 (万人)	分行业就业总人数 占比(%)	每新增100万元增加值 所拉动的新增就业(人)
合计	38323.6	14931.2	100.00	5.79
采矿业	596	8.5	1.14	2.68
制造业	10471.3	1637.4	22.74	4.7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466.9	14.9	0.90	2.14
建筑业	5809.1	950.3	12.69	10.32
批发和零售业	4008.5	6443.2	19.63	11.7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434.8	1173	4.90	6.47
住宿和餐饮业	706.9	2235.3	5.52	17.8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10.7	44.8	1.98	3.67
金融业	1831.6		3.44	2.59
房地产业	1268.9	171.7	2.71	2.2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290.1	299.3	4.86	8.7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182.9	48.9	2.31	6.1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53.2	7.7	0.68	7.08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32.9	1303.9	3.26	11.74
教育	2230.5	138.2	4.45	6.97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47.8	132.1	2.40	6.2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19.8	180.3	1.13	8.2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2508.7		4.71	5.7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二号)。

注:表中合计数含从事农、林、牧、渔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①庞氏骗局是投资领域的一种欺骗式运作方式。

②二战后,国际统计标准逐步将金融行业纳入GDP核算的内容,现行核算体系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创造的GDP视为同质的,进而忽视了实体经济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来源。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页。

④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https://www.bea.gov>。

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实体经济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落实在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首先,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补齐现代化短板,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其次,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紧紧依靠我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全产业链优势,加快实现我国的工业化从数量型、粗放型模式向科技创新引领的、绿色的、高附加值的模式转变,实现工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再次,要构建现代化产业的基础设施体系。以交通、能源、水利、电信等为代表的物质型基础设施都具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的特征,是建设农业强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筑牢我国人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基本实践。

(三)实体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

经济力和科技力是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和直接体现,而科技力是提升经济力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左右着综合国力。目前,全球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趋激烈,谁拥有强大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强大的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谁才能在大国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展现出良好的韧性。尽管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郭克莎,2019),制造业比重下降符合客观规律,但鉴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状,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意味着不仅要做大制造业总量,更要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将推动资源从低附加值领域向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有利于形成高质量资本积累,从而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科技力在增强综合国力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主要是以制造业为载体实现的。如果没有制造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那么很多科技成果应用和重要技术创新将缺乏试验、推广和产业化的支撑。在科技的支撑下,一方面,制造业内部单个部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同时制造业内部行业之间及制造业同其他行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增强,有助于实现外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制造业专业化分工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实现效率提升下的效率经济。可见,制造业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坚强的根基。另外,大部分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制造业。即使在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其制造业部门的科技创新投入占比仍然很高。例如,在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有64%的人供职于主要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公司,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高达70%(Bonvillian,2012)。根据工信部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有了明显提升,制造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0.85%增加至2021年的1.54%,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已达10.3%。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有力推动了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进而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遵循。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芒。其中,“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部署,既强调全局观、整体观,在统筹中进行总体谋划和顶层设计,又注重牵住“牛鼻子”,着重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通过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来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

(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内生动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经济中主要是由供给侧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性失衡和由此引起的供给端质量水平不高。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①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表述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的哲学方法论,明确了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其评价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基本途径是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此后,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兼顾需求管理,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协同发力,以促进国民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可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从市场运行和国民经济运行角度看,供给与需求这一对矛盾中,供给侧的适配性缺陷是主要矛盾,总需求量的不足是次要矛盾,因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解决市场运行和国民经济运行的内生性问题为主。但是,由于总需求的结构是经常性的变量,同时影响需求总量,因此,也要重视需求侧的政策调整和需求变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②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愈发剧烈的中美大国博弈,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看,在内需与外需这一对矛盾中,内需成为主要矛盾,外需成为次要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因此,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样“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③新发展格局是开放条件下的“双循环”,前提条件是要形成自立自强、具有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因此,需要进一步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由于供给与需求、内需与外需这两对矛盾都是长期存在的,因此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法论就是“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④。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不仅抓住了两对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而且也兼顾了次要矛盾的解决。这个基本方法论的经济学含义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内生动力,以需求侧调整为变量补充;以扩大内需为基本战略,以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阻滞,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更高水平平衡。

(二)增强制造业供给的适配性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可靠路径

“十四五”规划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占比有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2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26.29%,为历史最低水平,而反观那些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等收入阶段的大国,它们的这一比重平均仍达到29%,其中有一半超过了30%(郭克莎、彭继宗,2021)。因此,正处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中国,更需要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合理区间,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为此,要深化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制造业适配性,才能达到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的目标。

第一,要以高端制造业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制造迈进提供了动能。与传统制造业相比,高端制造业具有附加值高、技术知识密集、关联程度高、供给适配性强等鲜明特点,从而能够为制造业发展注入新活力。美国在1987—2011年间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0%,是其他制造业的30倍,若撤去这两个产业,这段时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将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②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

^{③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55、161页。

从2.6%下降至0.6%(Martin et al,2014)。当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虽有上升趋势,但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低。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根本要靠科技创新。一方面,要培育和创造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加快完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激发要素市场活力,鼓励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引导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技术深度融合,激发创新主体跨界分布式创新势能,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创新的叠加、倍增、乘数效应,推动“卡脖子”技术协同攻关,补齐高端制造短板,切实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

第二,要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提升传统制造业效率,增进其对需求感知和挖掘的能力,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和竞争力。围绕这个目标,需要解决市场变化和需求信息的及时获得问题,建设以行业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着力解决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还要对企业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运营管理、仓储物流以及营销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增强各个环节互联互通,促进产业关联、产业链延伸,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从而促进供给与需求的新跃升。

第三,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以供给创造需求。纵观每一次科技革命,其发展往往以新兴产业集群为支撑,进而引发新的社会需求,促进经济新一轮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构成的新型动力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通信方式变革,以3D打印、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支撑的智能制造,彼此融合和相互作用,将有力推动生产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重大转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要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动作用。

(三) 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基本保障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是实现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消费已经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必须提升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仍然较低,2022年为43%,较2013年的42.2%提升并不明显,且距离全球60%的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同时,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客观存在。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虽然2009年以来这个指标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徘徊,2021年为0.466(见图4)。因此,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充分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初次分配要更加注重效率,把“蛋糕”做大。要进一步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再分配应当更加注重公平,分好“蛋糕”。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保等手段有效调节初次分配,推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居民的综合边际消费倾向,改善消费预期,为促进和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支持和引导慈善资源下沉,拓宽具有意愿和能力的个人、企业、组织参与慈善的渠道,探索慈善活动的有效实现形式,完善慈善事业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均衡流动。总之,要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有机结合,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将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转化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条件

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要素大规模集聚,激发创新活力,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造成我国市场分割,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既有自然因素,也有垄断因素,还有地方政府行政性垄断因素。基于以上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首先,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根基。以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为抓手,优化综合运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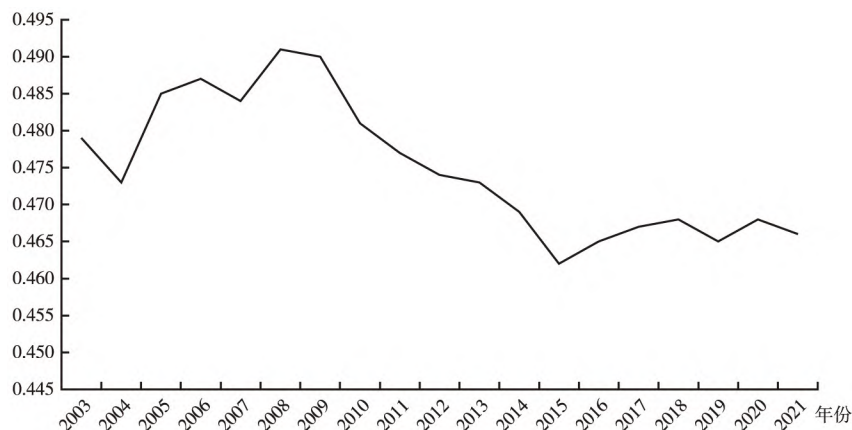


图4 2003—2021年中国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22》。

通道和枢纽布局,建立城乡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打通区域间基础设施堵点,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增强各种运输方式间的协调性与互补性。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消除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实现物理和信息的高效率连接。完善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推进不同区域市场规则的深度融合,强化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增强监管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其次,切实贯彻实施《反垄断法》,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增强反垄断法执法司法工作的统一性、权威性、可预期性,保障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平等使用要素资源、共享统一大市场带来的机遇。最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目标,淡化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强化人民至上理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地方政府从承担经济发展职能为主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着重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弱化地方政府产生地方保护和地方分割的内在动机,令其自觉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来。

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也是为了更好利用国内国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在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过程中,通过消除各种地方保护和地方分割现象,健全统一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为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创造了条件。在实现国内国际市场更好相互联通的条件下,一方面,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高质量要素资源,而且能够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从而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逐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不仅有利于培育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和全球分工的竞争新优势,并且有利于加速推动中国从全球规则的跟随者转向规则的制定者,推动国际规则、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怎样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问题,其中还充满了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还要按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统一起来,成为实践的指南,也成为理论创新的典范。

参考文献:

-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习近平,2018:《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
-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 郭克莎 彭继宗,2021:《制造业在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郭克莎,2021:《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趋势与“十四五”时期政策思路》,《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 刘骏民 王兴,2014:《货币政策冲击的非对称性影响——虚拟经济直接创造GDP的验证》,《经济学动态》第9期。
- 刘晓欣 田恒,202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
- 彤新春,202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探索与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经济纵横》第6期。
- 徐奇渊,2020:《双循环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金融论坛》第9期。
- Bonvillian, W. B. (2012), “Reinvent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The role of innovation”, *Innovation* 7(3):97-125.
- Drucker, P. (1989), *The New Realities*, London: Heinemann.
- Martin, N. B. et al(2014), “US manufacturing: Understanding its past and its potential fu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28(1):3-25.
- Su, D. & Y. Yao(2017), “Manufacturing as the key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for middle-income economies”,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2(1):44-70.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or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PEI Changhong^{1,2} NI Jiangfei³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3. National Academy of Innovation Strategy, Beijing, China)

Abstract: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foundation of a major country'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wealth creation. Prioritiz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real economy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real economy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the value and use of goods, the production of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material resources, and the “trinity” of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turnover, providing us with a scientific basis for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econom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eparated from the real economy i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nly the cause of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but also a deep-seated cau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ur country started with the real economy and also needs to rely on it to move forward into new future.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way to implement the 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but also the basic task of consolidating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Marxist methodology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rea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and expand domestic demand as the basic strategy in order to achieve a dynamic equilibrium on a higher level with supply creating demand and demand leading to supply, through the dynamic coordination of supply reform and demand management,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reinforcing each other.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Real Econom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rxist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胡家勇)

(校对:刘洪愧)